



No.C2015010

2015-12

## 中国应该主动积极参与 TPP 谈判

余淼杰 张睿\*

**内容摘要：**由美国所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而由于其设立的一系列高标准准入条件，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TPP 谈判尚且存在一定的争论。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 TPP 谈判成员国占中国国际贸易很大比重，加入 TPP 协定可享受成员国间的关税减免；另一方面，TPP 所设立的高标准准入条件与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和目标一致，因此中国加入 TPP 谈判，不仅可以在贸易上获益并促进改革，还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增强在全球贸易舞台上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参与 TPP 谈判。

**关键词：**TPP 劳动力成本 比较优势 改革

### 一、引言

2015 年国际贸易多边谈判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莫过于由美国主导的，一共有 12 个国家参与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简称 TPP）的实质性进展了。自美国和日本这两大贸易体宣布加入 TPP 协议谈判之后，这一跨区域的贸易协定便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除了贸易自由化的各项举措之外，TPP 的亮点还在于其规定了一系列涉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经济环境监管等方面的经济改革要求，符合这些要求的国家才能获准

---

\* 余淼杰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睿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进入 TPP 的谈判,因此 TPP 也普遍被认为是高水准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WTO)。

自 TPP 谈判伊始,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TPP 谈判的争论便开始出现:有人忧虑若加入 TPP,则中国不得不进一步放开一系列行业,从而对国内的就业和企业造成冲击;有人则担忧中国若被 TPP 排除在外,则会丧失大量的出口市场份额,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除此之外,TPP 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许多观察人士将 TPP 协议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其政治上的目的在于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而 TPP 的高标准也被认为是为了阻止中国加入 TPP 而设立的障碍。但除开地缘政治角力的考量,若中国被 TPP 排除在外,会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进出口贸易造成怎样的影响? TPP 的高准入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又决定了,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TPP 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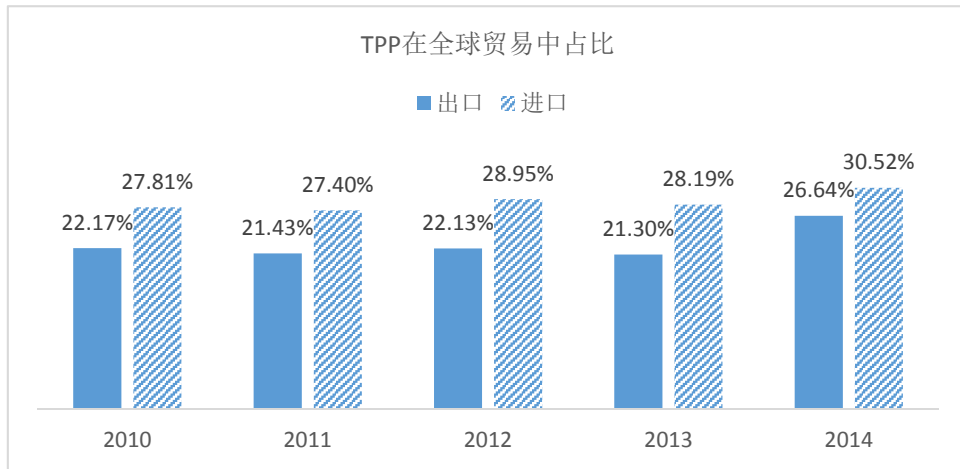
本文的分析认为,中国加入 TPP 协议,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但总体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且符合中国各项经济领域改革的大致方向和路径。在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通过数据揭示 TPP 协议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分析 TPP 成员国在中国全球贸易伙伴中的地位;第三部分阐述中国目前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局面,并对比在各个出口行业中中国与 TPP 成员国的出口比较优势;第四部分分析 TPP 协议中的各项准入标准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联系;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 二、TPP 对中国有多重要?

目前 TPP 谈判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加拿大、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智利、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 12 个成员国,若 TPP 协议最终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会为中国的进出口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一个地区贸易协定来说,成员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这一协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图 1 展示了 TPP 十一个成员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大小。自 2010 起,TPP 成员国总共的出口规模从占世界总出口 22% 上升到 27%,相应的进口规模也从占世界总进口的 28% 上升到 31%。由于 TPP 协议中包含了两个贸易大国:美国和日本,因此 TPP 协议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这期间,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也有着显著上升,到 2014 年底,中国占世界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例分别为 15% 和 12%。因此从体

量上看，TPP 成员国和中国一起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接近半壁江山，无论中国是否最终加入 TPP，都会对全球贸易的格局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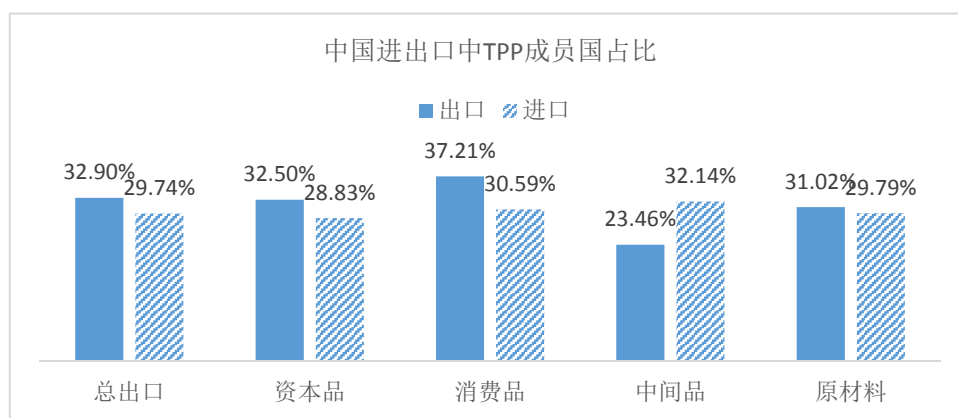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TS

图 1：TPP 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

由于 TPP 成员国包含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 TPP 协议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从进出口两方面揭示了 TPP 成员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重要地位。图 2 展示了 TPP 成员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在中国的总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小。总体上，对于 TPP 的出口和从 TPP 的进口分别占中国总体进出口的 33% 和 30%，TPP 协议影响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全球贸易额；进一步细分不同的贸易产品类型，在出口中，对于 TPP 成员国的消费品出口占总消费品出口的 37%，为所有产品类型中最高，其次为资本品（32.5%）和原材料（31%），对 TPP 出口占比最小的是中间品，但也占总体中间品出口的 23%。

在进口中，有 32% 的中间品进口来自 TPP 成员国。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越来越多公司将生产流程分离到不同的国家，这促成了大量加工贸易企业的产生，而在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比重（Yu, 2015），因此大量来自 TPP 成果的进口中间品，很可能反映了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 TPP 成员国企业，如技术较为先进的美国、日本企业的生产环节外包，从而形成大量的加工贸易进口。消费品（31%）、原材料（30%）和资本品（29%）进口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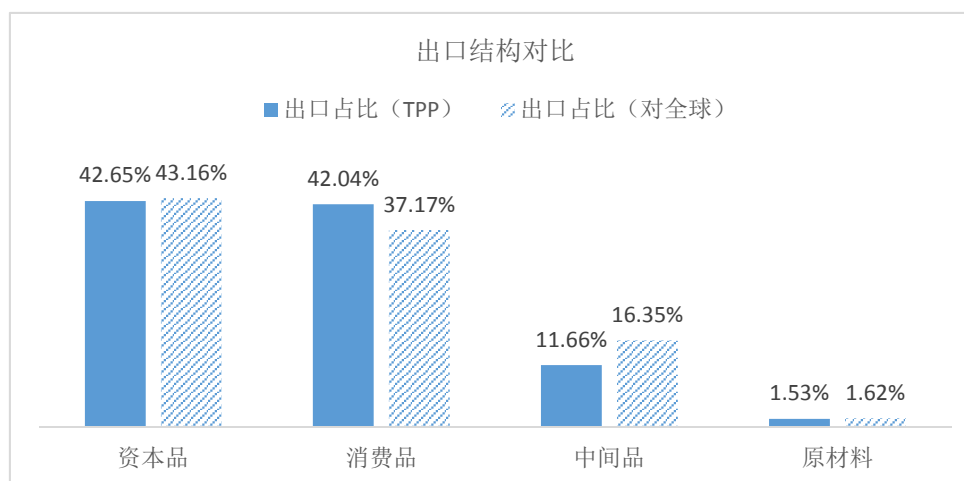
总体上来说，TPP 成员国对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大量的中间品进口反映了中国和 TPP 成员国之间不仅有贸易伙伴关系，还可能存在紧密的产业链上下游关系。一旦这一价值链关系断裂，重新寻找价值链伙伴的成本可能相当大，远高于单纯重新寻找贸易伙伴所需的成本。



数据来源：WITS

图 2：中国对 TPP 成员国的贸易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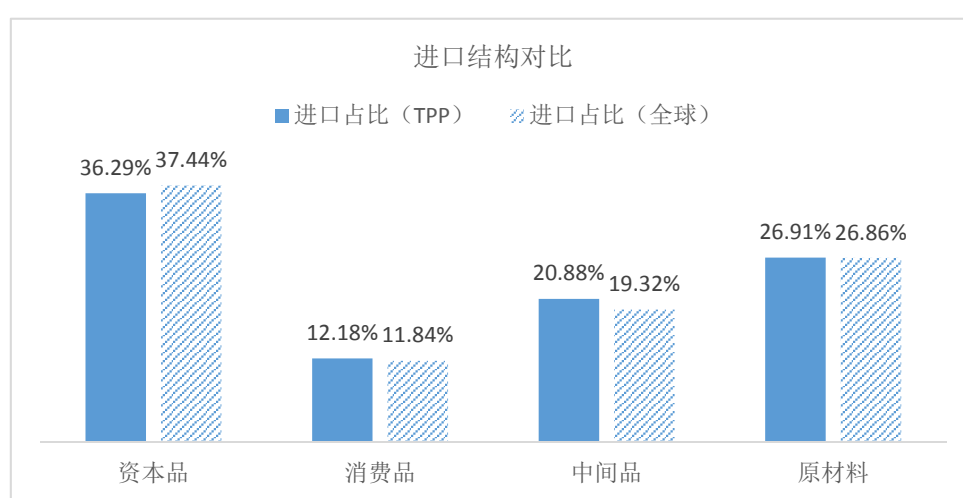
我们接着对比中国在全球的出口结构与中国对 TPP 成员国的出口结构异同。图 3 显示，中国对全球的出口结构与中国对 TPP 成员国的出口结构十分相似：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口均占到 40% 左右，中间品出口大约在 10-15% 之间，而原材料的占比最低，均在 1.5% 左右。



数据来源：WITS

图 3：出口结构对比

图 4 显示进口结构的对比。从 TPP 成员国进口的产品构成也和中国总体进口状况非常类似：中国的进口主要以资本品（36%）和原材料（26%）为主，中间品（20%）和消费品（11%）的占比较小。进出口结构的相似性反映了 TPP 成员国是中国全球贸易的一个代表性样本，因此对于 TPP 成员国的贸易状况变化也能很好地反映中国在全球贸易状况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原材料出口的占比很小，进口的占比则很大，这一方面说明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国是一个原材料资源较为缺乏的国家，另一方面，TPP 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智利、秘鲁等，则是我国进口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国。



数据来源：WITS

图 4：进口结构对比

综上所述，由于 TPP 成员国本身贸易体量巨大，占中国在全球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在各个进出口类型种类上均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对于中国来说，TPP 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是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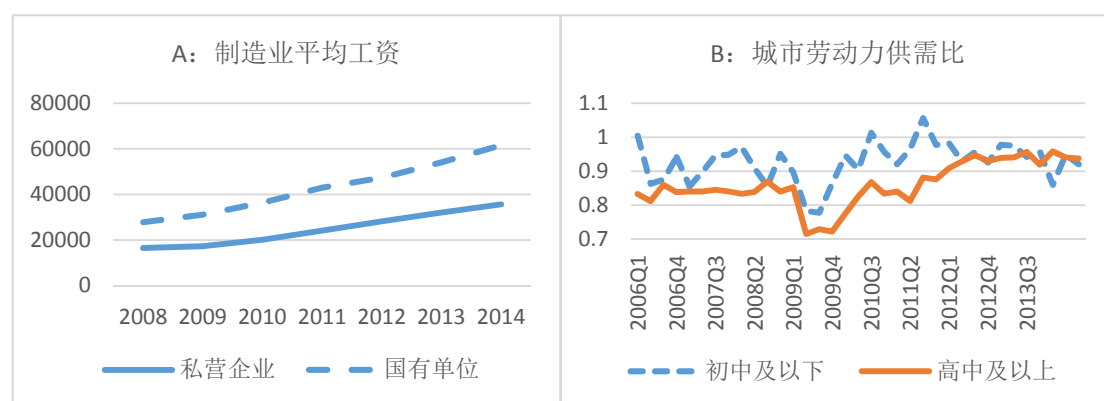
### 三、劳动力成本上涨与出口面临的挑战

#### （一）劳动力成本上涨

自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对外贸易出口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十余年来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动力。而在初期，促进出口快速增长的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这一现象与国际贸易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相一致：作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且经济体量巨大的国家，在全方面的贸易自由化和关税减免

进程中，中国必然会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以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纺织行业为例，从 2000-2005 年出口价值的总增长达到惊人的 250%-300%（Khandelwal 等，2013）。因此在开放初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快速出口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在工业化初期，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制造业部门面临着无限的劳动力的供给，因而工资成本极低，从而形成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巨大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但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渐显现，原本看似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开始逼近甚至达到“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上升而上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的上升也使得制造业工资水平水涨船高。



数据来源：WITS

图 5：平均工资与劳动力供需比

图 5A 呈现了自 2008 年以来制造业中的私营企业和国有单位各自的平均工资走势，在 08-14 年六年间，两个部门的平均工资均增长了 120%左右，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态势明显；图 5B 则进一步呈现了不同教育程度的城市劳动力供求比例，自 2006 年一季度以来到 2014 年，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城市劳动力供求比逐渐走低（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减少），到 2014 年已经从初期的 1 下跌到 0.9。与之相对的，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城市劳动力供求比则逐渐走高，到 2014 年已经从初期的 0.84 上升到接近 0.95。图 5 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经过过去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上，中国已经从过去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情况转变为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的状况。而从劳动力供求的结构上，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在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寻求质量升级和价值链攀升，从而转变劳动力需求的情况。

总而言之，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已成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会逐渐侵蚀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出口结构，维持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中国企业在目前经济转型时期所需面对的重大问题。

## （二）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基于比较优势的分析

在中国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形下，若中国被排除在 TPP 协议之外，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作为一个地区性贸易协定，TPP 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形成关税协定，在协议国之间实行低关税甚至零关税，而对协议之外的贸易国征收较高额的进口关税。前面已经提到，TPP 成员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形成关税协定并将中国排除在外，无疑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但究竟哪些行业、哪种类型的产品会受到最大的影响，是我们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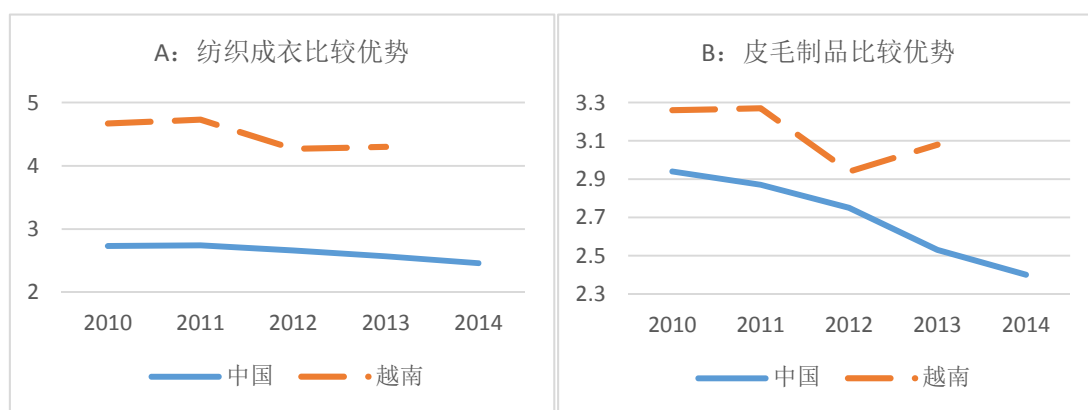
直观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必然伴随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比较优势的下降，加上关税壁垒的负担，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显然会受到 TPP 协议的大幅影响。由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工资上涨，许多在中国设厂的跨国企业和本国企业面临着产能转移的问题，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能的去向，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转移到内陆的地区省份，二是就近转移到劳动力丰裕的东南亚国家，而 TPP 协议成员国之一越南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一些案例可以佐证越南正利用其在劳动力禀赋上的优势对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造成威胁：在 2010 年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著名运动鞋品牌耐克最大的外包生产国，而在 2010 年，越南代工厂生产所占的比例达到 37%，超过中国大陆的 34%，成为耐克在全球最大的外包生产国。

而从加总的国家层面上看，一国在某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可使用 Balassa (1965) 所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这一指标进行度量，其计算公式如 (1) 式：

$$RCA_{is} = \frac{X_{is} / \sum_{st} X_{ist}}{\sum_{it} X_{itst} / \sum_{st} \sum_{it} X_{itst}} \dots \dots (1)$$

若 $RCA_{is}$ 大于 1，意味着  $i$  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出口行业  $s$  产品的比较优势，若  $RCA_{is}$  小于 1 则不具比较优势。我们首先对比中国和越南在两个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纺织成衣和皮毛制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图 6 展示了 10-13 年中越两国在这两个行业上比较优势的变化，可以看到，越南在纺织成衣和皮毛制品这两个行业上对于中国已经完全占优，之所以中国在这两个行业上还保有巨大的出口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南本身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因此无力蚕食中国巨大的出口市场份额。

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继续上升，从长期来看，与其他较低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必然会逐渐丧失。此外，TPP 成员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因此，假如中国被排除在 TPP 协议之外，原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会面临额外的贸易壁垒这一不利局面，TPP 成员国的对于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很有可能进一步从中国转移到 TPP 协议国内部，进一步削弱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的竞争力。



数据来源：WI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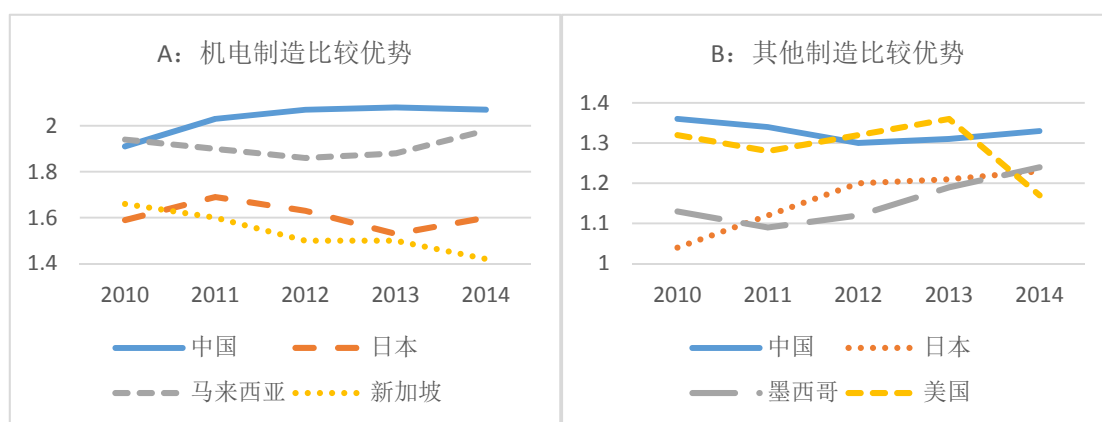
图 6：纺织成衣与皮毛制品比较优势演化

而除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之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会不会受到这一协议的影响呢？如前文所述，资本品的出口占中国对 TPP 成员国出口的 33%，因此我们考察重要的资本品出口：机电产品制造这一行业的比较优势变化。



我们沿用 $RCA_{iS}$ 指标，对比中国和若干在机电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 TPP 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行业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其比较优势是否巨大？图 7A 展示了 10-14 年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相应比较优势变化，从中可以有以下几点观察：第一，在这几个国家中，中国在机电制造行业的比较优势最大，到 14 年已经达到 2.05 左右，而其他国家虽然也具有机电行业上的比较优势，但是与中国还存在差距；第二，虽然中国在这一行业相对而言的比较优势最大，但是其他国家呈现一定的追赶态势，特别是马来西亚，在 2014 年比较优势已经逼近 2，而作为高端制造业的强国，日本近年来在机电制造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比较优势的对比显示，虽然中国目前在机电制造这一重要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和其他 TPP 成员国相比差距并不大，这意味着一旦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贸易壁垒的产生很有可能抵消部分中国的比较优势。考虑到 TPP 成员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在机电制造行业上本身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差距不大，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情况相似，TPP 的形成可能促使 TPP 成员国对于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类型上的进口需求转移到 TPP 内部，使得中国对于 TPP 的资本密集型出口面临挑战。

进一步从贸易模式考虑，由于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本丰裕型的国家，因此大量的资本品和机电制造出口更可能反映了中国通过承担加工贸易从而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事实。因此若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则可能进一步阻碍中国通过国际贸易与全球各国进行价值链整合的进程，减小加工贸易的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的作用，对于中国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产生阻碍作用。



数据来源：WITS

图 7：机电制造与其他制造比较优势演化

我们进一步考察其他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图 7B 可以看到，与日本、墨西哥和美国几个 TPP 成员国相比，中国依然在其他制造业上享有最大的比较优势，但其相对优势并不大；同样的，日本和墨西哥呈现出在比较优势上的追赶态势，因此在面临额外的贸易壁垒时，中国在其他制造业上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可能遭到侵蚀，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综上所述，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目前面临着比较优势的丧失，与部分 TPP 成员国相比甚至处于劣势；而在资本密集型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商，中国虽然目前相对于 TPP 的成员国具有相对的出口比较优势，但优势并不大。由于 TPP 成员国占中国与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假使中国最终被排除在 TPP 协议之外，由此产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可能使得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雪上加霜，竞争力进一步削弱；同时也可能使得中国相对于 TPP 成员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其他产品上的比较优势缩小甚至消失。

因此若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在目前外需波动性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下，将进一步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比较优势的丧失，在中长期，这可能引起大量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将工厂迁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资本的撤离不仅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也会减少国内的生产资本存量，减少就业岗位，从而对长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中国应该加入 TPP 的谈判。一方面，加入 TPP 能避免可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于出口和经济社会的负面效果，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又能进一步分享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果实；另一方面，加入 TPP 还能增强中国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对于中国在后 WTO 时期的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添上重要砝码。

#### 四、TPP 准入标准与中国的改革路径

以上论述主要关注 TPP 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可能影响。而除了自由贸易所关注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减免，TPP 协议还涉及经济监管标准，货币自由可兑换，产权制度安排、市场准入等一系列高标准的经济改革方案。目前外界对中国

加入 TPP 的主要顾虑便来自于 TPP 所设立的这一系列高标准的准入要求，其中的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等条款更是被认为是为了将中国排除在外而所设立的，许多人认为 TPP 是美国“重返亚太”，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一项举措，旨在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庞大的经济影响力。

但我们认为，抛开地缘政治角力的考量，TPP 协议所设定的这一系列要求，实质上与中国的改革大方向和目标一致，因此与其将其视作为了阻止中国加入 TPP 而设立的绊脚石，不如将其视作推动国内改革的契机，进一步深化在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从而为迎接未来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体系和经济规则做好充分的准备。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重要的方面阐述 TPP 的各项具体要求及其与中国目前改革方向的联系。

第一，和国有企业有关的规定。TPP 协议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本土私营企业时一视同仁，采用同样的监管标准和监管实践，同时也禁止对国有企业提供任何非商业性的帮助。一句话，TPP 要求各个成员国能够做到让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在各个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国企改革一向是重中之重，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实现政企分离，使得国有企业脱离浓厚的行政色彩，参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但目前在中国，大量国企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各种生产资源，而私营企业却在这方面存在困难。典型的例子是国有企业往往拥有所谓的“预算软约束”，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而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则面临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成本高企，有时甚至不得不借助于风险较大的非正规金融融资途径如民间借贷等，从而放大了金融风险。

此外，许多研究也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生产率明显低于私营企业（Hsieh 和 Klenow, 2007；Khandelwal、Schott 和 Wei, 2013；等），因此有理由相信目前的信贷资金和其他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一定的所有制歧视现象。若能与 TPP 协议一致，真正使得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资源配置市场上和产品市场上做到公平竞争，那么一方面，可以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能够获得资源，从市场再分配这一角度上改善资源配置，提高中国在各个行业的总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竞争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激励国有企业改善自身运营模式，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个国有企业部门的竞争力。

第二，知识产权的保护。TPP 同时也要求成员国实行国际通用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数字化技术愈发发达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空前重要。特别是在中国，过去依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模式才是未来继续实现增长潜力的方向。对于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体来说，知识产权的保护保证了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所赋予的发明者对于产品的专有权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激励机制，为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中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幅减少以往常见的剽窃、抄袭、盗版等现象，则是推行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

从经济基本上说，“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从供给侧推动经济改革，是在长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必要举措，而长期中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则是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当一个国家到达世界技术前沿时，其增长的后发优势已经消失，唯一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途径便来自于自主的创新研发。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既是为了形成有益于自主创新研发的土壤，也是为了我国达到世界技术前沿之后的持续发展未雨绸缪。

第三，关于环境和劳工权益保护。TPP 协议在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保护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包括共同应对污染、过度砍伐、过度捕捞等行为，从法律上和实践中保护基本劳工权利，消灭童工现象和雇佣歧视等。在中国，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是这两年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一方面，由于早期政府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对于工业生产的环境规制一直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煤炭等能源进行火力发电，造成了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对人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在劳工权益保障方面，早期为了吸引外资，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竞相降低企业税率和其他各项企业规制的做法，即所谓的“逐底效应”（race to the bottom），其中便包括劳工保护标准。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劳工冲突的事件，凸显在某些地区基本的劳工保护标准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在维持经济增长和加强环境保护之间达到平衡，尽快普及清洁能源在工业生产和交通工具中的应用，尽快摆脱对于煤炭

等能源的重度依赖；另一方面，消除就业歧视，加快劳动力的流动，保障基本的劳工权益，才能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进一步减少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使得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拉动作用，为经济的结构转型提供动力。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虽然 TPP 制定了较高的准入标准，在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并不具备加入的全面条件，但细细分析之下，TPP 的主要准入标准，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大方向不谋而合。TPP 所制定的高标准准入条件，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WTO 之后的全球和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发展潮流：在关税壁垒减免的基础上，对消除非关税壁垒，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和各项监管制度的实践提出了全方面的更高要求。由于加入 TPP 的谈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因此若中国提交加入 TPP 的申请，正好利用加入 TPP 谈判的窗口期，进一步深化国内的各项改革措施，以符合 TPP 的各项标准；而在符合上述标准加入 TPP 之后，又可进一步享有 TPP 所规定的各项贸易和投资开放条件所带来的贸易投资全球化红利，可谓一举两得。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加入 TPP 这一机遇可能加速我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进程，但是否能够在谈判进程完成之前完成改革，完善各项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章并有效执行，也是我国在经济改革中所面临的挑战。但改革早晚要进行，改革所带来的挑战迟早要到来，因此从长期来看，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应对挑战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机遇，我国应在加入 TPP 谈判的同时，积极主动地推进各项改革。

## 五、结论

自新世纪以来，加入 WTO 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强劲的外部需求，从而使得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外需不确定性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的宏观大形势下，TPP 的出现既为中国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

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加入 TPP 谈判。一方面，鉴于目前的 TPP 成员国占中国与全球贸易份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加入 TPP 令中国可以享受成员国之间相互的关税减免，从而减缓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丧失进程，并进一步维持资本

密集型和其他制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保持出口额的平稳增长；另一方面，由于 TPP 的准入条件与中国许多改革的重要内容相一致，因此加入 TPP 并参照其要求推动改革，从根本上也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而更重要地，TPP 协议代表了未来国际贸易协定的发展潮流，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从而掌握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这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 参考文献

- [1]. Balassa, Bela, 196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33, 99–123.
- [2]. Hsieh, C. T., &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 [3].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 Wei, S. J., 201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69-2195.
- [4]. Yu, M., 2015,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Economic Journal*, 125(585), 943-988.